

2011年8月21日“北京-东京论坛”

第五分论坛：安全保障对话——第二部分：“建立安全互信，加强交流合作”

发言稿（日本研究所 李薇）

### 一、日本战略定位妨碍中日互信关系的建立

2009年以来，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进入调整期，整个进程在2010年呈现加速态势。尽管美国的超级军事力量在地区安全的权力结构上仍旧地位显赫，但是在区域内一系列政策和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特别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权力和财富结构的变化以及对美国的战略性挑战，促使东亚区域安全局势进入重大战略转型期。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变化是地区安全局势变化的主要原因。

这个转型期的特点是：第一，区域内的大国关系在合作、竞争、冲突中起伏不定，大国关系的传统政策框架难以应对区域力量变更和政策更新所带来的动荡。第二，美国为维持其东亚安全架构——这个架构以地区军事存在、安全义务和东亚领导权力为核心，将其战略重心“重返亚洲”。

一年多来，美国高调宣示了美军力量的优势和军事同盟的首要地位，过多使用联合军演，提升军力部署，扩展军事与防卫合作等。在美国的东亚防务战略中，日本对于美国犹如“茫茫大海中的重要据点”（前防长科恩），巩固美日同盟关系是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的前提条件，“用中国牌来延长日美同盟寿命”（文艺春秋，2010年5月号，对谈：春原刚、约瑟夫·奈、盐谷紘）是美国战略精英的共识。为了套牢日本，在鸠山上台后浮出水面的“安保论争”中，约瑟夫·奈巧妙地引导日本说：“驻日美军如同是日本为了让美国旅行保护日本义务而扣押的人质”（2010年12月文艺春秋出版《日美同盟 vs. 中国·北朝鲜》，春原刚、约瑟夫·奈、阿米蒂奇），言外之意是，日本才更加需要这个同盟。美国时刻提醒日本：“日本的国家大战略应以日美同盟为中心”（2011年1月8日读卖新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裁约翰·哈姆雷）。

民主党政权执政两年来，在对美关系上走了一条小疏离大回调的道路。从鸠山政权的“东亚共同体”主张到菅直人政权的快速修复美日关系并坚定地回归美日同盟关系的战略选择，都是在东亚格局变化中寻找自身存在的结果。赖肖尔在其著作《日本人》的结语中指出，日本总是非常敏感地不断自问自己在现在的世界上应扮演什么角色，热衷于为自己谋求一个特殊的角色，但无论如何，日本根本不适合充当东西方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因为对于东西方来说，日本都是一个令人难于理解的国家。在此轮的东亚新格局形成过程中，日本仍旧没能够充当好中间人的作用。菅直人政权外交两大特点，一是对美关系的急于修复和紧密配合，二是外交触手更多地伸向安全领域。日本已经毫不掩饰地借助美国力量充当制衡中国的战略角色。

2010年12月的《防卫计划大纲》将对华战略指向从2004年的“仍需加以关注”的表述调整为“让地区和国际社会担忧”；将“基础性防卫”调整为“动态防卫”；将加强西南防务作为布局调整的重点。日美2005年版共同战略目标为日美积极合作应对国家恐怖主义等威胁，时隔四年

在 2011 年 6 月 21-22 于华盛顿召开的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 2+2 会谈（外长防长）上，日美发表联合声明，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华指向更加明确：一是摆出强硬姿态牵制中国（虽未点名）的海洋军事能力，把安全防御范围扩大到南海，二是加强保护太空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2011 年 8 月的《防卫白皮书》开始明确指责中国，使用“扩大”、“常态化”、“高压对抗”、“遵守国际规范”等表述；新增“南海动向”条目等。

日本的防卫动向表明，其防卫范围在逐步扩大，防卫手段越来越显示出进取性和强硬姿态。这种借助美国抑制中国的战略选择以及日趋强硬的对华战略防范态势，对地区安全造成紧张氛围，发展下去将导致中日双边关系的对立。当前日本的战略利益定位与中国主张的稳定周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利益定位相去甚远。

## 二、关于建立互信关系的三点提示暨建议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寻求中日共同战略利益的前提是，战略互信关系的建立。在国家层面，互信关系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因素。为此，笔者认为需要着重强调以下三点。

### 1、不可把中日关系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

中日关系的背后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是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忽视了一个事实：尽管日本将本国外交的定位与日美同盟关系画上了等号，但日美同盟关系却并不等同于美国外交的全部。在中日关系的背后同样也存在着中美关系因素，虽然中美关系是冲突与合作并存，但合作还是中美之间的主流。因此，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如果日本把对华关系的基本定位于日美同盟关系之中，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就难以建立，战略互信也无从谈起。日本应当注意到这个问题，审视目前的战略定位以及对华关系定位是否出了错。

对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以及对地区形势的误判，是导致日本在 2010 年钓鱼岛事件中采取了非常态的处理方式的主要原因。相对于美国对华既合作又遏制的做法，日本官方的做法显示出的更多是遏制。

### 2、否认钓鱼岛存在争议意味着 切断合作与沟通之路

中日之间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才有 1972 邦交正常化时中国领导人与日本领导人之间关于该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默契原则的建立。但是，近年来，由于日本傍美抑中的战略选择以及在钓鱼岛问题上转变到否认争议的强硬立场上，通过夸大中国军事力量的成长以及渲染中国威胁的存在，不由自主地走向对立的立场，严重扰乱了中日关系的大局。

日本国内对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和军事发展的认识多为消极，“中国威胁论”迎合多数日本人的失落和灾难心理，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可立即转化为外交安全危机。在钓鱼岛事件的处理上，

日本政府将强硬的对华外交作为国内政治的筹码，将“政治主导”替代有效的外交途径和手段，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既不承认争议也不搁置争议，切断了共同开发的合作之路。

从应急处理的层面看，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处理过程本身，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首先，政治领导人的外交领航作用至关重要，及时就突发事件进行沟通与协商，可以避免受情绪驱动的混战出现，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双方即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所造成的伤害；其次，中日双方缺少对争议地区的共同管理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如果建立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并常态化运作，将会减少因冲突引起的不良后果。由于菅直人政权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的事实，损害了两国领导人之间沟通的基础，阻碍了机制的建立。

最近，菅直人内阁要员又在冲绳扬言要为钓鱼岛“不惜一切”，声称保卫领土比经济关系更重要。这是再次否认争议、用假想煽动民意的过激行为，有碍于安全互信的建立。

### 3、在处理中日关系上政治领导人的领航作用极为重要

中日之间存在三个敏感问题——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归属问题、台湾问题。多年的经验证明，只要中日两国领导人在这三个问题敏感问题的处理上采取谨慎的态度，就可以避免突发事件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首先，由于日本国内在历史认识的最基本认知原则上未能统一认识，发出的声音是模糊的或者自相矛盾的，甚至是被撕裂的。因而长期未能与中国等东亚国家达成真正的历史和解。其次，在钓鱼岛和台湾问题上，都可以看到昔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现实问题变得尤为复杂和敏感。美国学者约翰·道尔指出，在1952年安保体制下，美国在赋予日本主权的同时，也消灭了日本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的萌芽，结果，得到同盟关系的美国，在强行将封锁中国的责任推给日本的同时，让日本脱离了亚洲，直至1972年美国的“越顶外交”（2010年《文艺春秋》5月号）。生存于这样的历史认识和冷战背景下的日本，要想发展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的良好关系，特别需要领导人发挥领航作用。1972年中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四个重要文件的签署都是双方领导人领航的结果；同时，也正是由于领导人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问题上处理不当，才导致双边关系时有恶化。

2009年以来日本领导人的表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日本“强化西南防务”与美国“重返东亚”的战略重心转移是同步推进的。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要不要回归亚洲以及如何回归亚洲的问题，遗憾的是日本至今仍旧把自己摆在亚洲的特殊位置上。其次，近来的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明确地否认争议，甚至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不仅切断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路，而且对地区安全带来危险。再次，日本插手中国的南海问题，采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外交手段，对中国与特定国家的双边解决机制制造障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因日本领导人的误判而难以前行。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似乎还没有想清楚要谋求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双边关系。

### 三、结语

笔者认为，日本未能客观地判断中国，也未能客观地为自己定位。中国正处在实现工业化阶段，日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中国人均 GDP 仅相当于日本的十分之一，日本人均 GDP 早已名列世界前茅；中国刚刚取得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就已经面临一些与日本相似的结构性问题，日本则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 40 年左右才出现这些问题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日本的增长方式却即便在发达国家中也是能耗最少环保最佳的可持续性较强的。中国于日本差距还很大。为什么日本会失落和恐惧？因为，世界在变，而日本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却没能变革，二十年来失去的是方向和客观的自身定位。迷失方向的国家最容易恐惧和失态。如果日本面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发展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将自己打造成为高品位的中等国家（比如成为亚洲的瑞士），那么，日本还将是个受尊重的国家；如果客观地找到自身发展的定位，持有客观的平和的心态，在处理中日之间敏感问题上就会冷静得多，才能有效地通过对话与交流增进互信，使中日关系得到顺利发展。